

义和团

研究

一百年

中国义和团研究会 编
苏位智 刘天路 主编

齊魯書社



义和团研究一百年

中国义和团研究会 编

苏位智 刘天路 主编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义和团研究一百年/苏位智,刘天路主编. — 济南:齐鲁
书社,2000.9

I.义… II.①苏…②刘… III.义和团运动—研究—
概况 IV.K25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0779 号

义和团研究一百年

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

苏位智 刘天路主编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日照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6.375 印张 2 插页 653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333-0903-0
K·260 定价:60.00 元

序 言

李文海

在义和团运动过去整整一个世纪的时候,由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组织编写、苏位智和刘天路主编的《义和团研究一百年》正式出版,无疑是一件十分适时也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这是一部对义和团研究进行世纪学术总结的著作。当我们即将告别二十世纪的时候,不论是流连往昔,还是瞻顾未来,都会很自然地回顾百年来走过的历程。因此,近年来,从各个不同学科和各个不同视角进行百年学术回顾的书,已经出了不少。但是,以我的孤陋寡闻,像这样对一个具体历史事件,作出如此系统、详尽的学术总结的,似乎还不多见。由于各个篇目的撰写者大多是长期从事义和团研究的著名专家,文章的内容又不仅限于研究状况的客观介绍,更多的还是对各种学术观点及研究趋势的分析评述,就更增加了本书在学术上的深刻性和权威性。

义和团运动是发生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我国下层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斗争。如果拿今天人们的认识水平来衡量,义和团在当时的所作所为,无疑有不少可訾议之处。运动的发动者和参加者,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缺乏先进的武器。指导他们行动的是掺杂着浓厚迷信色彩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而手中执持着用来对抗洋枪大炮的不过是原始的大刀长矛。这样的运动无法避免悲惨失败的命运。但脱离历史事件的客观环境和条件,以今天能

够和应该做到的去要求历史人物,这既丧失了起码的历史感,也远离了科学的历史观,是任何严肃的学术态度所不取的。义和团运动的主题是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它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沉重打击,毕竟是中国人民在新的世纪里走向新的更高形式的斗争的一个必经阶梯。

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反思和评论,事实上,从运动刚刚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起初,不同阶级和不同政治派别的代表,为着各自的政治需要,就对它进行了各式各样的议论,有的诅咒,有的嘲讽,有的同情,有的赞颂。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更多地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总结这场运动,评论者也逐渐从政治界转向学术界,使它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并一直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占有特殊的位置。这个历史进程,在本书中有着生动具体的描述。

读一读这本书,我们可以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状况,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受到中外历史学家长期广泛关注的学术课题。书中不但详细介绍了我国包括港台学者对义和团运动各个方面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成果,还具体评述了日本、欧美、俄国及前苏联学者关于这一领域的学术情况与进展。这一历史事件如此强烈地吸引着中外学者的研究兴趣,是因为这场非同寻常的斗争,当时不仅震动了中国,而且震撼了世界;不仅对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发生了重大的作用。

其次,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认识,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存在着各种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评价。正如本书有的作者提出过:“在中国近代很少有什么历史事件像义和团这样引起如此长期的众说纷纭的讨论。义和团的谜一样的起源,浓厚的神秘主义气息和暴烈的抗争行为,以及同清王朝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在国际社会引起的剧烈震动等,都构成了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关注的话题。”不

同观点和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鸣,是学术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我们衷心希望这种好的学术风气,能够继续保持并不断发扬光大。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学术的不断积累和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水平,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接近于客观历史真实的。唯物史观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曾经说过: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由于历史材料的不足,所以永远总是不完整的、没有完成的。人们只能在不断发掘和掌握新材料的过程中,用科学的历史观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才能够有所发现,有所创新,逐步达到对历史真相的更加深刻的认知。

对于既往的学术回顾与总结,同时也是对今后的学术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我们热切地期望,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立足于已经达到的学术高度的起点之上,对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取得新的突破,达到新的辉煌。

2000.8.17.于

中国人民大学林园

目 录

序 李文海(1)

第一部分 百年研究述评

- 义和团运动研究一百年 陈振江(2)
- 建国前的义和团运动研究 孙占元 徐玉凤 唐月民(26)
- “语境”中的“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 50 年 王学典(50)
- 义和团起源研究的回顾与随想 程 献(74)
- 义和团运动发展过程研究 王如绘 刘晓焕(101)
-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社会研究 喻大华(126)
- 义和团思想意识和社会心态研究 张 鸣(144)
- 义和团与清政府及其他派别关系研究 吴士英(158)
- 义和团时期中外关系研究 黎仁凯(180)
- 义和团时期列强军事侵略研究 苏位智 刘天路(203)
- 建国以来反教会斗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赵树好(221)
- 50 年来义和团运动资料概述 庄建平(239)
- 1949 年以来台湾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 杜继东(253)
- 西方义和团运动研究一百年 [德]R. G. 狄德满(277)
- 日本义和团研究一百年 [日]佐藤公彦(309)
- 俄苏学者对中国义和团运动研究的评述 [俄]A. A. 博克沙宁(333)

第二部分 百年论著目录

编例	(348)
第一编 中文论著目录	(350)
一 论文、资料	张洪英 蒋秀丽(350)
(一)综述	(350)
(二)性质	(363)
(三)历史意义与教训	(367)
(四)组织与源流	(371)
(五)社会背景与发生原因	(377)
(六)发展阶段	(396)
(七)各地义和团活动和反教会斗争	(399)
(八)口号与政治思想	(431)
(九)清政府的态度与政策	(435)
(十)其他派别的态度与活动	(441)
(十一)列强对华政策与武装侵略	(446)
(十二)东南互保	(461)
(十三)中外舆论	(463)
(十四)辛丑条约	(468)
(十五)书评、史料、文物	(473)
(十六)学术动态	(511)
(十七)人物研究	(518)
(十八)文艺作品	(532)
附：“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的文章	(538)
二 著作、图书	苏丽丹 关家铮(543)
(一)综述	(543)
(二)背景与教案	(558)
(三)组织与源流	(562)

(四)义和团运动在各地	(563)
(五)义和团时期的清政府	(573)
(六)两宫西巡	(574)
(七)帝国主义侵略及中外关系	(576)
(八)辛丑条约	(591)
(九)人物研究	(595)
(十)文艺作品	(601)
(十一)其他	(608)
三 台湾、香港地区研究论著目录	杜继东(610)
(一)论文	(610)
(二)著作	(619)
(三)史料	(620)
第二编 外文论著目录	(623)
一 英文	[德]R. G. 狄德满(623)
二 德文	[德]R. G. 狄德满(700)
三 法文	[德]R. G. 狄德满(735)
四 意大利文	[德]R. G. 狄德满(769)
五 其他西文	[德]R. G. 狄德满(776)
六 俄文	[俄]A. A. 博克沙宁[中]苏位智(781)
七 日文	[日]佐藤公彦(796)
八 韩文	[韩]金希教(824)
后记	(833)

第一
部分

百年研究述评

义和团运动研究一百年

陈振江

发生在 19、20 世纪交替时期的义和团运动是震惊世界的大事变。这场运动是中国人民以暴力反抗外来侵略和保卫社稷家园的一种特殊的抗争形式,它所涉及的社会层面和国际关系最为广泛,各种矛盾最为错综复杂,运动骤起骤落,矛盾瞬息万变。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引起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仇视,于是它们制造种种借口唆使清政府严厉镇压,并于 1900 年组成英、法、俄、德、美、日、奥、意八国联军大举入侵,挑起烧杀劫掠不遗余力的殖民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空前残酷的毁灭性的灾难,时称“庚子国难”。这场国难异乎寻常地震惊世界,也异乎寻常地刺痛了中国人的心,使他们对这场运动痛感惆怅和茫然!更由于中外反动势力大肆歪曲事实真相以及诋毁义和团运动的言论满天飞,再加上义和团自身的蒙昧落后及其浓厚的神秘色彩而使义和团拼死反抗外国侵略的正义性和笼统排外的落后性交织在一起,令人是非莫辨、真相难明。因此,长期以来中外学者、政界和舆论界对义和团的评价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成为 20 世纪一大历史悬案。

从义和团运动研究的百年历程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有着不同的研究倾向和重点。但是,有关义和团的成因、源流、性质、口号、作用和历史意义始终是

各家争论的焦点。而且讨论逐步深入,几乎每个历史时期都提出过有创见、有影响的论点,出现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著,为正确的评价义和团运动和深刻认识中国国情与革命道路以及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提供了充分的史实和理论依据。因此,百年来有关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多半不是单纯的学术论争或坐而论道,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和现实意义。但也不乏科学严谨和高水平的学术论著涌现。这里谨就 20 世纪百年间义和团运动研究中形成的几次研究热潮的情况略作评述。

一 义和团运动早期研究的政治性及其导向

义和团运动的早期研究,系指义和团运动从酝酿、失败到辛亥革命前夕十多年间的各种研究活动及其著述、章奏、评论与不同形式的记述情况。19 世纪末期,义和团在广泛的群众性的反洋教、反侵略斗争的基础上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而聚众起事,使封建统治阶级一时间弄不清其底细而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他们急于了解义和团的来历、成因及其起事的真正的目的和性质,以便制订是剿是抚的对策。因此,这一时期研究义和团的人多是山东、直隶等地的官绅,研究的重点是义和团的源流、起事的原因与性质。早在 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山东巡抚张汝梅奉命派员到鲁西北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得出义和团来源于“乡团”的明确结论,并于是年 6 月 30 日(五月十二日)将调查情况奏报清廷。奏称:在咸同年间,“直隶、山东交界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继改称梅花拳,近年复沿用义和名目。”^①他建议清廷不镇压义和团,而采取“谕饬绅众,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并“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②的笼统控制政策,成为义和团来源于“乡团说”的创始人和主抚派的代表人物。次年九月,直隶吴桥知县劳乃宣在查阅有关文献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义和团教门源流考》,他主

要根据嘉庆二十年直隶总督那彦成镇压白莲教的奏折,认为义和团是乾嘉时期的义和拳的延续,属于白莲教的支派——八卦教的离卦教,是历来被取缔的“邪教”,并提出严厉镇压的主张,成为义和团来源于“邪学说”的创始人和主剿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以张、劳为代表的义和团的早期研究者,大都是从考察义和团的源流或起因以确定其性质,并以此为根据作出抚与剿两种对立的决策。可见,他们研究义和团不是做“纯学术”的文章,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他们的研究结论和研究手段在当时和以后的政治上、学术上都有很深的影响。这说明义和团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脱离政治的所谓“纯学术”研究,而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

义和团时期及其失败后的10年间,有关义和团的著述、日记、书札、笔记、文集等等不下百余种,或综述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的全过程,或记述某地义和团的活动情况,大多是作者的亲身见闻,亦有记录传闻者,成为义和团研究的重要史料。但其观点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贬损、诋毁义和团,称之为“拳匪”、或“拳祸”。有的亦记述了教民为害地方、官府袒教抑民、清军残杀义和团以及记述八国联军烧杀抢掠等等事实。这些著作中,以曹侗的《古春草堂笔记》、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乔析生的《拳匪纪略》、艾声的《拳匪纪略》、管鹤的《拳匪闻见录》、柴萼的《庚辛记事》、仲芒氏的《庚子记事》等等较有影响。尤以恽著和李著中所分析的义和团运动的起因是与甲午丧师、戊戌政变和己亥建储互为因果的,记述影响较大。但是这些记述所强调的不是由于外国侵略的加深的必然结果,而是封建顽固势力为报复外国人而煽起义和团运动。

资产阶级各政治派别对义和团的评论很不一致,情况比较复杂,但各自的研究都具有为其政治服务的明确目的。义和团运动时期,以康、梁为代表的改良派对义和团攻击诋毁不遗余力。梁启

超说：“吾观天下最奇最险之现象，则未有如拳匪之役者也”；“义和团为政府所指使，为西后所主持”。^③改良派所控制的报纸《中外日报》、《国闻报》和《清议报》等，连续报道和评论义和团运动，提出一些似是而非而又颇有迷惑性的观点。其中尤以《中外日报》发表的《义和团与新旧两党之关系》、《论近日致祸之由》、《原近时守旧之祸》和《原乱》等几篇评论最为混淆视听。评论说：旧党“误以为新党皆外人所嗾使”，故组织义和团而“而殄灭之”^④；蔑称义和团是由野蛮派、小说派、闭关派和联俄派这“四种旧党化合所成之新物质也”^⑤；断言“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⑥。这种是非颠倒、歪曲和否定义和团反帝爱国的言论，一时间流布颇为深广。

与康、梁等人相反，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家和研究者，对义和团的正义斗争以深切的同情和关注，旗帜鲜明地为义和团伸张正义，盛赞义和团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发扬光大义和团的反帝爱国精神。1900年12月，《中国旬报》第33期发表题为《主权篇》的评论，义正词严地驳斥改良派对义和团的种种污蔑，盛赞“义和团与外国争权”的爱国精神，深信这种精神“必发自立、自主、自由之胚胎而使支那大陆终成为一民主之大国也”^⑦。1901年，《开智录》发表《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评论，首先指出：“世界上最令人可惊、可惑、可憎、可恶者，莫如今日之所谓文明国也。”这些“所谓文明国”的侵略罪恶才正是引起义和团反抗的根本原因。评论盛赞义和团“出于爱国之心”，“为中国种无算之强根，播国民独立之种子”^⑧。正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具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促使他们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积极主动地从劳动人民中寻求力量，从而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并在理论上触及到了义和团运动与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关系、农民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等历史所赋予的重大命题。

二 20—40年代义和团研究的学术性与两种史观的对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进一步促进了民族的觉醒和民族运动的高涨。觉醒了的人们面对国势日蹙和帝国主义步步进逼的严峻形势,从不同的角度反思历史,探索造成这种“国将不国”危机局面的根源与解救的途径。于是研究中国近代史、探讨自鸦片战争以来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变的前因后果,总结历史教训,寻找救国救民的真正力量和道路等重大课题,逐渐形成研究风气。刚刚过去的震撼中外的义和团运动自然成为研究的热点。由于西方历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输入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遂使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形成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尖锐对立。这种情况在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最为明显。

二三十年代研究义和团运动的专著只有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捷的《义和团运动史》。但在各种中国近百年史和中国近代史的著述与教材中大都设有论述义和团运动的专章。在一些专史中也有较大篇幅的论述。其中以1922年出版的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和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等书中论述义和团运动的篇章最具有代表性,影响也深远。梁著别出心裁地从“因、缘、果、报”四个方面论述义和团运动的前因后果、性质与特点。所谓“因”,是指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原因,且有内因和外因(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之分。他认为内因是中国人民传统的排外心理和迷信心理;外因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纲纪废弛。“缘”是指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和导火线。他把缘又分为亲缘(直接缘)和间缘(间接缘)。他认为戊戌变法是义和团的“亲缘”,帝国主义侵略和政变而谋废立等等是间缘(助缘)，“因缘和合,果斯生焉”。他把义和团的“灭洋”

和反侵略活动,以及对外宣战等等都视为“果”,把义和团运动之“果”称之为“一幕滑稽剧”、“一种极奇特的病态”。义和团所得到的“报”则是八国联军入侵和《辛丑条约》的签订等等。梁启超从多方面分析义和团运动的起因不无可取之处。但他从根本上颠倒是非曲直,把帝国主义侵略这一引起义和团反抗的主要原因歪曲为“外因”,反而把排外与迷信视为义和团运动的“主因”或“内因”,把义和团与爱国清军英勇抗击八国联军蔑称为“极奇特的病态”^⑨。这种错误观点实际上是梁启超的旧调重弹而了无新意,只是在方法和理论上运用“因果果报”的唯心论推断出一套似是而非的错误结论,并被不少学人所接受。例如,高彦博的《中国近百年史纲要》说:义和团运动完全起于“排外心理”;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强调义和团的迷信心理,认为“自群众而言,唯有神道,义和团说遂起”。还有一些教材和著述亦采纳梁著的错误观点。

但也有一批资产阶级学者在深入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基础上得出比较客观、正确的结论。他们认为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最主要原因不是“传统”的排外与迷信心理,而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压迫的结果。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认为,义和团运动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欺凌而造成民众的“公共的积愤”和民众严重的“生活的不安”所致。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认为,主要是甲午战后割地赔款、教民横行乡里,其次是偿付赔款,人民负担加重和吏治败坏引起的。陈捷的《义和团运动史》较全面地论述了义和团运动并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他指出义和团的斗争方式虽然落后,但它具有强烈的民族反抗斗争的正义性,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民族精神。他说:“论者责其方法不善可已,至其反抗压迫之精神,则正中国民族性之表现也”;“而吾华民族主义精神之公然流露,实以此次运动为嚆矢,此又读史者所不可不辨也”^⑩。此书以严肃的治学精神正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方法和手段的原始落后,而充分肯定其坚决反帝斗争的民族精神。而

且论述充分、分析透彻、观点客观公正,使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学术性明显地增强。

随着中国人反帝运动的高涨,早期共产党人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林育南等人,从1922年开始,以《向导》和《中国青年》等为阵地,发表一系列的全面评价义和团的论文,实质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右翼势力反动唯心史观的清理和批判,是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继续和深化,并为义和团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他们研究义和团的主要倾向是认识国情为民族民主革命服务;研究的重点是全面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半殖民地化的加深的社会背景,正确评价义和团运动的成因和性质,深入剖析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等方面。

早期共产党人的研究者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和唯物史观全面评价义和团运动,得出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①;或“民族解放运动”等鲜明的结论。林根(即林育南)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太平天国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第一次表现,“义和团是第二次,辛亥革命是第三次”^②这一著名的论断,成为近代史上三次革命高潮说的创始者。他们在评论中充分肯定义和团和农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称赞义和团的排外精神“是中国国民革命头一次充分的表现”^③;定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样,都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的”^④,或者说“其重要不减于辛亥革命”^⑤。这些论点不仅充分肯定了义和团和农民的历史地位,还肯定了义和团所进行的这场民族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此外,他们尖锐地批评义和团“仇杀排外”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斗争手段的拙劣;指出义和团的失败“乃是经济落后的中国民族之历史的必然结果”^⑥。

早期共产党人的研究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义和